

姚際恆《詩經通論》的《詩》教觀 及其反漢學色彩

黃忠慎*

(收稿日期: 99 年 11 月 25 日; 接受刊登日期: 100 年 4 月 13 日)

提 要

姚際恆與崔述、方玉潤並稱為清代獨立治《詩》三大家，三人三書都有強烈的批判性，其中尤以姚際恆《詩經通論》為最。姚際恆對於歷代的解《詩》成果都不滿意，愈是權威性的、典範性的著作，愈容易成為姚氏的批評對象，於是，完成於漢代的《毛詩》學派解詩系統——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成為姚氏首要推翻的《詩》學文本。本文分析姚際恆《詩經通論》的《詩》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，歸結出姚氏批評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的內容，也針對這些內容進行評論，最後並指出姚書解釋意涵中的漢學風味，以突顯出該書的一大特色。

關鍵詞：姚際恆、《詩經通論》、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

* 黃忠慎，民國 44 年生，民國 73 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，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。曾獲國科會優等研究獎（民國 83 年）。近五年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七件，其中擔任主持人工作者五件，共同主持人兩件。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二十餘篇，分別發表於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、《臺大中文學報》、《漢學研究》、《文與哲》、《東吳中文學報》……等。

E-mail: 092538@gmail.com

一、前言

姚際恆（1647-1715）《詩經通論》、崔述（1740-1816）《讀風偶識》、方玉潤（1811-1883）《詩經原始》三書，在《詩經》學史上獲得了崇高而又極為特殊的評價，學界常將此三人視為清代獨立治《詩》三大家。¹假若說，三書在說《詩》方面有接近的特質與精神，那麼，康熙年間的姚際恆無疑最具指標意義，因為在他過世二十五年後，崔述才出生，不僅如此，年代更後的方玉潤將姚際恆視為具有權威性的前輩學者，《詩經原始》可以說是追隨在姚際恆之後繼續前進的。

長期以來，學者慣於以「獨立」、「超然」的肯定性評語用在姚氏身上，這些肯定性的評語具有相對性，而其參照的對象自然是傳統的《詩經》學。本來，對於清儒而言，《詩經》漢學與宋學的古老解《詩》成果都是先儒遺留下來的傳統，不過本文僅針對《詩經通論》的反漢學色彩進行論述，一來是因為已有學者檢視過姚際恆對於朱子《詩經》學的批評，²二來是因為對於姚氏來說，最主要的傳統是《詩經》漢學，尤其是《詩序》。

在以往，《序》說不僅代表了權威的詩篇主題判定，也代表了傳統解《詩》時預設的「《詩》教觀」。從姚氏對《詩序》的態度中，可以得知他對於傳統權威解題的質疑與否定，但是對於儒家《詩》教觀的堅持，姚氏則秉持傳統，甚至於，有時其為詩篇所作的說解，較諸《序》說更能維護傳統的《詩》教。由此可以得知姚際恆對於《詩經》傳統詮釋的態度，特別是，他對於傳統的取捨：承認

¹ 梁任公（1873-1929）於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整理清代學者治理《詩經》的成績，於正統派之外舉出姚際恆、崔述、方玉潤三人，以為此三人之書不同於傳統學者固守《毛序》、《毛傳》之說，而能獨抒己見。之後又有鄭振鐸（1898-1958）於〈關於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〉中以「極為重要」、「極重要」、「極重要」分別置於姚、崔、方三人《詩經》學著作之下。鄭氏所謂的「極重要」源於他特重此三書有許多獨特的新解，能超出毛、朱之外，力攻《毛序》之非。後來學者或以「懷疑派」、「超然派」、「獨立派」分別稱呼此三本著作，例如夏傳才在通論清代《詩經》研究的學術時，以「超出各派之爭的獨立思考派」統稱姚氏等三人，陳柱稱姚際恆為「懷疑派」，何定生稱姚際恆為「各派混戰中的超然的一派」。梁氏之說見其〈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（一）〉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5年），頁260；鄭振鐸之說見〈古代文學研究〉，《鄭振鐸全集》第四卷（石家莊：花山文藝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31-32；夏傳才之說見其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3年），頁228；陳柱之說見其〈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〉，林慶彰、蔣秋華編：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6年），中冊，頁345；何定生之說見其〈關於詩經通論〉，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，中冊，頁363。

² 詳林慶彰：〈姚際恆對朱子詩集傳的批評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8期（1996年3月），頁1-24。

三百篇貴為「聖經」的地位，也認同聖人以《詩》為教的觀念，但卻對後人解《詩》的過程與結果極不滿意，因此矢志追求聖人之意，要找出三百篇的真意或原旨。姚際恆除了勇於打破《詩序》的詩篇主題解釋權威，對於代表字詞訓釋權威的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，也取相近的方式對待，解詩過程中不斷予以質疑、駁斥，展現其無與倫比的批判性。

二、《詩經通論》的解詩體例與姚際恆的《詩》教觀

姚際恆，字立方，號首源，祖籍安徽新安，定居於浙江仁和，在辨偽學上卓有聲名，³成績不在閻若璩、毛奇齡之下，《清儒學案小傳》稱其：

少折節讀書，汜濫百氏，既而盡棄詞章之學，專事於經。年五十曰：「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，余婚嫁畢而注九經。」遂屏絕人事，閱十四年而書成，名曰《九經通論》。時潛邱力辨晚出《古文》之偽，先生持論多不謀而合。潛邱撰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屢引其說以自堅，而毛西河篤信古文，作《冤詞》與潛邱詰難。西河故善先生，以其同於潛邱也，則又數與爭論，先生守所見，不為下。先生又著《庸言錄》，雜論經、史、理學、諸子，末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持論雖過嚴，而足以破惑，學者稱之。⁴

四庫館臣則從負面的角度解讀姚際恆的人品與學術：

際恆生於國朝初，多從諸耆宿遊，故往往剽其緒論。其說經也，如辟圖書

³ 梁啟超謂姚際恆《古今偽書考》「列舉經史子部疑偽之書共數十種，中國多精鑿之論也」。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6。顧頡剛評論姚際恆及其《古今偽書考》云：「他敢於提出『古今偽書』一個名目，敢於把人們不敢疑的經書（《易傳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等）一起放在偽書裏，使得初學者對著一大堆材料，茫無別擇，最易陷於輕信的時候，驟然聽到一個大聲的警告，知道故紙堆裏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，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，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聾振聵的功效。」姚際恆：〈序〉，《古今偽書考》（北京：樸社，1933年），卷前，頁2-3。鄭良樹：「清代初年，能夠繼承宋濂《諸子辨》及胡應麟《四部正譌》的餘風，對群書加以考訂辨正，而給後人巨大的震撼力量的，應該是姚際恆了。」《古籍辨偽學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94。

⁴ 徐世昌纂，周駿富編：《清儒學案小傳（一）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年），卷4，頁660-661，〈潛邱學案〉附論姚際恆。

之偽，則本之黃宗義；辟《古文尚書》之偽，則本之閻若璩；辟《周禮》之偽，則本之萬斯同；論小學之為書數，則本之毛奇齡，而持論彌加恣肆。至祖歐陽修、趙汝楳之說，以《周易·十翼》為偽書，則尤橫矣。其論學也，謂周、張、程、朱皆出於禪，亦本同時顏元之論。至謂程、朱之學不息，孔、孟之道不著，則益悍矣。他如詆楊漣、左光鬥為深文居功，則《三朝要典》之說也。謂曾銑為無故啟邊釁，則嚴嵩之說也。謂明世宗當考興獻，則張柱之說也，亦可謂好為異論矣。⁵

本來評論一個人及其學術成績，可能因為立場與觀點的互異，而導致不一樣的結語，是以四庫館作為清初漢學家的大本營，其對於姚氏之議論古學、抨擊經師難以寬容，實為可以理解之事，只是，已有學者指出，姚際恆從未剽竊閻若璩之說，論小學之為書數，不僅並非本之毛奇齡，反而是毛奇齡受到姚氏之啟發，至於其他所謂姚際恆抄襲清初耆宿之論等等，也都是偏見之詞。⁶整體而言，姚際恆擁有強烈的疑古性格與批判力量，他以自由探究的精神面對經典，以此而建立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。

《詩經通論》原為《九經通論》中的一種，也是九書中唯一能保持全貌的著作。此書卷前有姚氏《自序》，署於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，但全書完成之後並未有刊本，一百零八年之後（嘉慶十八年〔1813〕）才由王篤發現此書之抄本，王氏並於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刊刻此書，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六十二冊，經部，《詩》類，除了姚際恆〈自序〉之外，另有道光十七年鄂山、蘇廷玉、周貽徽、王篤四篇〈序〉文，卷前又有〈詩經論旨〉、〈詩韻譜〉兩文。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，顧頡剛編輯《古史辨》，書中納入其與胡適討論姚氏之文字，兩年後，鄭璧成根據王篤刊本覆刊於四川成都。1958年，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顧頡剛之點校本。至今，《詩經通論》計有九種版本，其中四種屬於王本，五種屬於顧本。⁷據筆者所知，目前學者使用的最普遍的版本大約有二，其一為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另一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根據顧頡剛點校本重新排印的本子，於1994年6月出版，收入《姚際恆著作集（一）》，此書於各篇之前加上篇名，又據王篤刊本

⁵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），第5冊，卷129，頁2569。

⁶ 詳〔日〕村山吉廣撰，林慶彰譯：〈姚際恆論〉，林慶彰、蔣秋華編：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，上冊，頁65-87。

⁷ 詳林慶彰：〈本冊校印說明〉，《姚際恆著作集》，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4年），第1冊，卷前，頁1-4。

糾正了顧本的一些誤字，使用上頗為方便。⁸

《詩經通論》針對三百篇進行全面的解釋，全書計十八卷，卷一〈周南〉，卷二〈召南〉，卷三〈邶〉，卷四〈鄘〉、〈衛〉，卷五〈王〉、〈鄭〉，卷六〈齊〉、〈魏〉、〈唐〉，卷七〈秦〉、〈陳〉、〈檜〉、〈曹〉，卷八〈豳〉，卷九至十二〈小雅〉，卷十三至十五〈大雅〉，卷十六、十七〈周頌〉，卷十八〈魯頌〉、〈商頌〉。此外，中研院的本子因為是以顧氏點校本為底本，故在「卷前」之前放入〈本冊校印說明〉、〈出版者說明〉、〈顧頡剛序〉諸文。⁹

《詩經通論》各篇之前不錄完整的《詩序》，但由於每篇常以評述《序》言作為詮釋的開始，故讀者也可以從中接觸到《詩序》的精要之言。至於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、孔《疏》、朱《傳》等漢宋權威解釋，則視實際狀況需要，在論評舊說時會分別帶入其解。此書以「通論」為名，首重各詩的主題與章旨之說解，其次，姚氏亦極重視藝術技巧之詮解，認為「詩有賦、比、興之說，由來舊矣，此不可去也。蓋有關於解詩之義，以便學者閱之即得其解也」，「興、比、賦尤不可少者，以其可驗其人之說詩也。古今說詩者多不同，人各一義，則各為其興、比、賦。……詩旨失傳，既無一定之解，則興、比、賦亦為活物，安可不標之使人詳求說詩之是非乎！」¹⁰故《詩經通論》於全詩各章之下，簡單而逐一地標出詩韻與作法，例如其解〈邶風·雄雉〉，全文如下：

雄雉於飛，泄泄其羽。我之懷矣，自貽伊阻。本韻。○興也。

雄雉於飛，下上其音。展矣君子，實勞我心！本韻。○興也。

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。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！本韻。○賦也。下同。

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。如字。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！。本韻。〔評〕名言。

〈小序〉謂「刺衛宣公」，〈大序〉謂「淫亂不恤國事」。按篇中無刺讖淫亂之意。《集傳》則謂「婦人思夫從役於外」。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，于末章「百爾君子」難通，故不敢強說此詩也。

〔〈雄雉〉四章，章四句〕¹¹

⁸ 案：本文引用《詩經通論》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為主，再以《姚際恆著作集》本參校。

⁹ 案：其中〈出版者說明〉係指中華書局1958年原說明。

¹⁰ 《詩經通論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第62冊，卷前，頁8：1a-9：2b。

¹¹ 《詩經通論》，卷3，頁48：13b-14a。

基本上，關於生難字詞的訓釋、名物制度的解說，皆非姚氏致意之處。當學者表示《毛傳》的解釋過於簡略的時候，要知此處其內容起碼包括：「興也。雄雉見雌雉，飛而鼓其翼泄泄然。」「詒，遺；伊，維；阻，難也。」「展，誠也。」「瞻，視也。」「伎，害；臧，善也。」¹²而姚氏對於〈雄雉〉一詩則是並未進行任何文字釋義工作。在全詩主題部分，《詩序》：「〈雄雉〉，刺衛宣公也。淫亂不恤國事，軍旅數起，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，國人患之，而作是詩。」《詩經通論》的讀者必須參照完整的《序》文，否則讀不到「軍旅數起」以下數句，而姚氏以「篇中無刺譏淫亂之意」否決《序》說，充其量就是讓讀者知道他無法接受超出文字表面意涵的解釋，至於假若詩文分明「無刺譏淫亂之意」，何以作《序》者執意要將主題闡釋延伸到刺譏淫亂的角度，則非《通論》一書論述所及。

不過，也有很多時候，姚氏願意花費較多的篇幅來解釋詩篇，以同在〈邶風〉的〈旄丘〉為例，姚氏在四章之下分別標以「興也」、「賦也」、「賦也」、「比而賦也」，又提供四章之詳解：

〔一章〕姪炳曰：「《毛傳》訓『誕』為『閭』，無義。『誕』與『覃』通，猶葛覃之覃也。《書》之『誕敷』亦作『覃敷』，可證。覃，延也。『誕』從『延』，有延長意。詩蓋曰：彼旄丘之上有葛，其節何蔓延而長？雖前高後下之丘，猶遠相及。我之伯、叔同處一地，乃多日而不相恤，何也？」此說存之。〔二章〕「與」，與我伐狄也。能左右之，曰「以」。〔三章〕晉士蒍曰「狐裘蒙茸，一國三公」，此斷章取義，不必執彼解此。黎在衛西，故言非我君之車不東來于衛。如此解，自直捷。或謂黎寓衛東，言非衛大夫之車不東來云云，甚迂，不可用。〔四章〕「瑣尾」，細微意。「流離」，《毛傳》謂鳥。若以「流離」為漂散意，則「之子」二字似鮮著落；而釋鳥但有鷓鴣，無流離，未詳。「褒」，當從《毛傳》，謂盛服貌。漢武帝制策曰「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」，師古注曰：「褒然，盛服貌」。鄭氏謂「笑貌」，謬。¹³

上面這段文字夾敘夾評，這正是《詩經通論》的解釋特色，而其內容雖較諸被評

¹² 《毛詩正義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年），卷2之2，頁86-87。

¹³ 《詩經通論》，卷3，頁50：19a-19b。案：文中「漢武帝制策」五字，原作「曹氏漢策」，茲據中研院中國文哲所《姚際恆著作集》本（卷3，頁87）改。

爲訓詁簡略的朱熹《詩集傳》少了一百多字，¹⁴但對於讀者的瞭解詩義，大概也已足夠，只是，此處的評解並未以引述《序》文作爲開場，讀者仍須自行查考《詩序》，才能對於整體論述擁有較爲具體的理解。

以上所述爲《詩經通論》在形式上容易窺知之處，但決定其書之實質內涵的是姚氏的《詩》教觀。事實上，絕大多數的古人對於傳統的《詩》教觀不能根除，姚際恆對於漢儒的說《詩》成績，有很強烈的批評，但其《詩》教觀其實承接先秦兩漢。

姚際恆表現在《詩經通論》中的《詩》教觀大約有兩個面向：其一爲對於「淫詩」說的意見，其二則爲慣於從政治的角度說解詩旨。前者是從先秦儒家的《詩》教觀來反對朱熹的淫詩論，後者則是承接漢儒以降的說《詩》取向。

在《詩經通論》卷前〈詩經論旨〉中，姚氏以「思無邪」一語駁斥朱子的「淫詩」說，又於〈鄭風〉末再度表達相關意見，以爲凡是內容沾染上「淫」的成分之詩，乃是采詩者「第以出諸諷刺之口，其要旨歸於思無邪而已」。¹⁵《詩經》確實存在一些「男女各言其情」且用語過於直接者，面對這些作品，姚際恆轉用采詩者的身份來爲看待，這是基於對《詩經》基本的教化觀點之維護。除了轉換說詩者的身份，姚氏也轉換解釋的角度來處理朱子所指稱的「淫詩」。如〈鄭風·東門之墀〉被當作男子欲求女子之詩，處處顯示此男子好色之心。但姚氏卻從反面說：「此女貞潔自守，不肯苟從，故男子有室邇人遠之歎……然則男子雖萌其心而遂止，亦不得爲淫矣。」¹⁶於是，在姚氏的解說轉向之後，不只此女貞潔，連原本充斥好淫之心的男子也被抑止，不得遂行。如此則根本無「淫」之事發生，也無「淫」人爲誰的問題。在姚氏的視域之下，《詩經》中並無淫詩存在，不僅如此，他對於前人以「淫詩」角度解說三百篇者，常用「唾」、「邪辭」、「可恨」、「汙齒」等情緒性的字眼予以痛斥，¹⁷可見他對傳統《詩經》教化觀點的堅持，

¹⁴ 李家樹：「《詩集傳》的訓詁雖然淺近易讀，但絕不簡當，有些地方就是太過簡略，連詩意也不好懂。」〈宋朱熹詩集傳簡評〉，《詩經的歷史公案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114。案：朱子《詩集傳》與姚氏《詩經通論》解〈旄丘〉所使用之篇幅約爲五百字與三百六十字。

¹⁵ 姚際恆：〈詩經論旨〉，《詩經通論》，卷前，頁10：5b-11：6a；卷84：29a。

¹⁶ 《詩經通論》，卷5，頁82：24b。

¹⁷ 姚際恆：「鄭氏曰：『草蟲鳴，阜螽躍而從之。』邪辭也。歐陽氏本之，又謂『喻非所合而合』；前輩說詩至此，真堪一唾！」。又批評朱子解〈王風·采葛〉爲淫詩，「尤可恨」；面對朱子解〈丘中有麻〉爲「婦人望其所與私者」，姚氏直指其「言之大汙齒」。以上分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2，頁33：6b；卷5，頁74：8b；卷5，頁75：11a。

此外，姚際恆也慣用政治的角度解讀詩篇，如解〈召南·標有梅〉為「卿大夫為君求庶士之詩」，甚至不惜引用他認為有穿鑿之嫌的何楷之說，把〈曹風·鴉鳩〉說成是曹君稱頌晉文公之詩，只因詩中有「正是四國」、「胡不萬年」之語。¹⁸

姚際恆的《詩》教觀源自於他對三百篇的基本看法，他深信「《詩》三百五篇，經孔子手訂」，甚至在〈自序〉中直言「諸經中，《詩》之為教獨大」、「欲通《詩》教，無論辭義宜詳，而正旨篇題尤為切要」。也直指《詩經》為「聖經」。¹⁹顯然，姚氏的「聖經觀」已經決定了《詩經通論》的立場。²⁰

姚際恆是絕對支持並力行傳統儒家的《詩》教觀的，從此一角度來看，其解經立場仍屬保守，然而，姚氏被視為創新派的研《詩》學者，也是經學史上的共識，此中關鍵就在他把《詩經》學的老傳統切割為二，一為傳統的注疏成果，一為傳統的儒家《詩》教觀，而前者是被其棄如敝屣的。

三、姚際恆對《毛詩序》的批評

姚際恆極為肯定《詩經》作為經典的地位，不過，姚氏對於解釋經典的傳、注，則持反對的立場。他曾說：「嘗謂經之有解，經之不幸也。曷為乎不幸？以人皆知有經解，而不知有經也。曷咎乎經解？以其解致誤，而經因以晦，經晦而經因以亡也。」又說：「諸經之亡，皆亡於傳注。」²¹傳、注本為理解經典的輔助性工具，但在姚氏心目中，這些卻反而是閱讀經典的障礙，於是他亟欲排除傳、注，掃除解經路上的荊棘，以直通聖經殿堂。

以《詩經》而言，完成於漢儒之手的傳注包括解釋詩旨與經文的《序》、《傳》、《箋》等，這些傳統解釋在姚際恆看來都不值得尊重，其中尤以《詩序》更是其集矢之的，因為《詩序》的功能在訂定詩旨，而詩旨的解釋不唯涉及詩義理解的問題，實際上更關係著意義、價值判斷的正確與否。所謂意義與價值判斷，也就是姚氏堅持的聖人教化之說。姚際恆與漢儒的想法是一致的，閱讀《詩經》以通

¹⁸ 分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2，頁38：15b-16a；卷7，頁110：23a-24a。

¹⁹ 分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7，頁234：20a；〈詩經通論序〉，卷前，頁4：1a；頁4：2a；〈詩經論旨〉，卷前，頁12：9b。

²⁰ [日]村山吉廣撰，林慶彰譯：〈姚際恆的學問（下）——關於詩經通論〉，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中冊，頁412。

²¹ 分見簡啟楨輯點：《禮記通論輯本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4年），上冊，頁275；姚際恆著，張曉生點校：〈序〉，《春秋通論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4年），頁5。

達《詩》教為先，但是他不認為《詩序》可以幫助讀者正確認識《詩》教，其云：

欲通《詩》教，無論辭義宜詳；而正旨篇題，尤為切要；如世傳所謂《詩序》者，不得乎此，則與瞽者之俛俛何異？²²

姚氏既要強調《詩》教的重要性，又要反對《詩序》的詮釋，如此自需切斷《詩序》與聖人之間的關連，才方便其對於《詩序》進行修正與批評。在姚氏看來，《詩序》的意義根源非如前儒所標榜的那般神聖，²³為了說服讀者，他用辨偽的角度分析《詩序》的來歷之真假，以為《詩序》出自東漢衛宏，而不是傳說中的子夏所作，又由於衛宏從學於謝曼卿，因此，姚際恆斷定「《序》之首一語，為衛宏講師傳授（姚氏自註：即謝曼卿之屬），而其下則宏所自為也」。姚氏把每篇〈序〉說中的第一句稱為「小序」（一般多稱「前序」、「古序」），以為是謝曼卿之流的講師所傳授的；第二句以下稱為「大序」（一般習稱「後序」、「續序」），是衛宏自己作的。不管是「大序」還是「小序」，都是東漢人所作。²⁴

姚際恆既然認定《詩序》為東漢人作品，非出於聖人之手，則面對其說，自可毫無顧忌地挑出其缺陷。在《詩經通論·序》裏，姚氏舉出《詩序》的幾個缺失。他說《詩序》首句犯下的缺點是固滯、膠結、寬泛、填湊，諸弊叢集。第

²² 〈序〉，《詩經通論》，卷前，頁5：2a。

²³ 關於《詩序》作者之說，時代愈後，新說愈多，《四庫全書·詩序二卷提要》列出十種以上的說法，而謂《詩序》作者之論乃「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」。詳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第1冊，卷15，頁330：2a-331：4b。今人張秀英則列出自漢至今的《詩序》作者異說29種，其中，作於孟子、劉歆黨徒之類的說法出自近人。詳張秀英：〈詩序作者與時代研究綜述〉，《重慶郵電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19卷第5期（2007年9月），頁121-127。案：要標榜《詩序》的神聖不可移動，就得強調其作者身份的神聖性或可靠性，所謂《詩序》出於孔子、子夏、孟子之類的說法，一旦被承認，就確定了《詩序》的權威性；另外，或有以為《詩序》為國史或詩人所作者，前者輔以國史采詩之說，可增加《詩序》的說服力，後者無異是要告訴讀者各篇〈序〉文的精確不移性，蓋詩人現身說法，無人有權可以質疑其解釋。另有謂毛亨、毛萇作《序》者，若認此說為是，亦可樹立《詩序》的權威，蓋就儒家《詩經》傳授譜系而言，如《漢志》所說，「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。」陸璣更詳言：「孔子刪《詩》授卜商，商為之序，以授魯人曾申，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魯人孟仲子，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趙人荀卿，荀卿授魯國毛亨，亨作《詁訓傳》以授趙國毛萇。時人謂亨為大毛公，萇為小毛公，以其所傳，故名其詩曰《毛詩》。」換言之，若謂《序》作於毛亨或毛萇，則其說解內容仍然是傳自孔門（不過，陸璣強調《詩序》作者為東漢衛宏，詳後）。以上兩段文字分見〔東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），第6冊，卷30，頁1708。〔三國·吳〕陸璣著，〔清〕丁晏校正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卷下，《古經解彙函》山陽丁氏本，收於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70。

²⁴ 〈序〉，《詩經通論》，卷前，頁5：2b；〈詩經論旨〉，頁9：2b-10：4a。

二句以下衛宏所作，則「尤極踳駁」。²⁵對三百篇的《詩序》之批評，姚際恆常用的辭彙包括：迂曲、附會、迂而無理、臆測、迂折、寬泛、執泥、鶻突、泛甚、無句、揣摩、混謬、泛混、杜撰、幼稚可笑、稚……等等。這些充滿負面意涵的辭彙、甚至嘲笑性的情緒性字眼，反映出姚氏對《詩序》的強烈排斥。對於反《序》者而言，《詩序》的迂曲不通僅從其對二《南》的解說就可一覽無遺。當擁《序》者認為將二《南》全部歸為後妃、夫人之作，是作《序》者苦心的安排時，反《序》者可以說這種成爲習套的作法拘執不通。姚氏就善用他反面的思考以取笑《詩序》之說，他指出，若非文王之世，則其男女豈不盡屬「踳垣鑿隙」之人乎？²⁶也引王質（1135-1189）「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耶」之譏評來表示他對二《南》之《序》的疑問。²⁷有時他也會發揮考證的精神，爲《詩序》的說法尋找根源，並批評其說都是穿鑿附會，如謂〈周頌·潛·序〉「季冬薦魚春獻鮪也」之說襲自《禮記·月令》；〈召南·采芣·序〉「夫人不失職」之語則附會《禮記·射義》「士以〈采芣〉爲節樂，不失職也」之文；〈鄘風·桑中·序〉則紐合《史記》、《禮記·樂記》二段文字而成；〈小雅·序〉中云「勞使臣」之語全本於《左傳·襄公四年》「〈四牡〉，君所以勞使臣也」之語；〈小雅·都人士·序〉全襲《禮記·緇衣》而說……等。²⁸由此可知，姚際恆不僅在〈自序〉與〈詩經論旨〉中大力斥責《詩序》，在解經的過程中，也以實際的動作批駁了諸多《序》說。綜觀《詩經通論》全書，姚際恆透過所謂不執泥、不滯固的「活法」來達到批評、解放《序》說的詩篇包括〈關雎〉、〈葛覃〉、〈卷耳〉、〈桃夭〉、〈采芣〉……等共八十二篇，²⁹此一數字雖未達到全《詩》的三分之一，但這是指其直接批評《詩序》的部分而言，此外還有許多詩篇，姚際恆在進行主題判斷時雖未指斥《詩序》，但他直接重新訂定詩旨或接受前儒之其他解釋，用此一方式來否決《序》說，不唯如此，前人批評《詩序》很少針對〈詩大序〉的內容而發，《詩經通論》則是連〈詩大序〉亦不放過，以襲取他說、說義不通、附會臆說、違反經旨等諸多理

²⁵ 〈序〉，《詩經通論》，卷前，頁5：2b。

²⁶ 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，頁25：18a-18b。

²⁷ 《詩經通論》，卷2，頁35：10b。所引王質之說見《詩總聞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4年），卷1，頁17。

²⁸ 分見，〈詩經論旨〉《詩經通論》，卷前，頁9：3b；卷2，頁32：4a；卷4，頁58：5b-6a；卷9，頁127：25b；卷12，頁167：12b。

²⁹ 篇目詳拙文〈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——從朱子到姚際恆、崔述、方玉潤〉，《興大中文學報》22期（2007年12月），頁157。

由來抨擊〈詩大序〉，³⁰是以有學者以為《詩經通論》是現存《詩經》著作中第一部真正全面攻擊《毛詩序》的書，雖其說未必正確，但已足以見出《詩經通論》的批判《詩序》是如何受到學者的注意了。³¹

整體而言，姚際恆勇於批評《序》說的內容，是因為對自己交叉運用客觀的考證與主觀的靈活解詩法（尤以後者為主）充滿自信，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，姚際恆是清初的辨偽名家，其辨偽成績頗受後人肯定，³²不過，他的考辨指出《詩序》出於衛宏之手，很難取得研《詩》學者的認同，案關於衛宏作《序》之說除載於《後漢書》之外，又見於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³³陸氏為三國吳人，早於范曄（398-445），足見三國迄晉，均有此傳說；只是，衛宏作《序》之說，不斷有學者提出質疑與考證，特別是，清代曾樸《補後漢書藝文志》列舉七驗，以證《詩序》非衛宏所作，其說之未諦未盡者，又有近人王禮卿為之補足，徐復觀也提出三大證據以明衛宏作《序》之說絕不可信，這些論證可謂綿密周延，衛宏非《詩序》作者之說，可謂已成《詩經》研究史上的定論。³⁴

³⁰ 詳趙明媛：《姚際恆詩經通論研究》（中壢：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0年12月），頁176-197。

³¹ 李家樹：〈清代傳統「詩經學」的反動〉，《詩經的歷史公案》，頁150。案：趙明媛以為，「《詩經通論》對於《詩序》的批評是顯而易見的，許多評論也較朱熹《詩序辨說》更為細密，對《詩序》的權威地位有進一步的破壞；然而，若論『第一部真正全面攻擊《毛詩序》』，似乎仍應推朱熹《詩序辨說》。」《姚際恆詩經通論研究》，頁269。誠如趙氏所言，《詩經通論》稱不上是第一部全面攻擊《毛詩序》的著作，不過，這裡涉及到「全面攻擊」四字的措辭問題，假若「攻擊」可以僅是指批評並指出其錯誤而言，那麼，早在朱熹之前，「不輕議二家之短長，而能指其不然，以深持詩人之意」的歐陽修，其《詩本義》對於《毛詩序》的批評就已經相當「全面」了，此所以清儒江藩在批評宋儒之經學時首列歐陽修之《詩本義》：「宋初承唐之弊，而邪說詭言，亂經非聖，殆有甚焉。如歐陽修之《詩》，孫明復之《春秋》，王安石之《新義》是已。」案：「不輕議二家之短長」為宋儒樓鑰之語，見朱彝尊著，馮曉庭等點校：《經義考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4年），第3冊，卷104，頁824。江氏之語見江藩著，鍾哲整理：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卷1，頁4。

³² 有關姚際恆的辨偽成績可參林慶彰：《清初的群經辨偽學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207-215；294-295；381-386；397-409。

³³ 陸璣：「……時九江謝曼卿亦善《毛詩》，乃為其訓，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，因作《毛詩序》，得風雅之旨。」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卷下，頁70-71。

³⁴ 分詳王禮卿（1909-1997）：《四家詩指會歸》（台中：青蓮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第1冊，頁14-19；徐復觀：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152-154。不過，衛宏固然不是《詩序》的作者，但跟《詩序》或許還是有某種程度的關係，今人或謂衛宏作的是潤色、集錄的工夫，或謂衛宏是在先前毛詩學者所作的《詩序》的基礎上作了比較大的加工修潤，使之更加系統化，政治教化思想更為突出而已。相關資料可參李家樹：〈漢毛詩序的存廢問題〉引黃節〈詩序非衛宏所作說〉，《詩經的歷史公案》，頁24-25；梅顯懋：〈詩序編撰時代考論〉，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第29卷第1期（2006年1月），頁93。

四、姚際恆對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的批評

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構成了《毛詩》學派的解釋內容，姚際恆不滿《詩序》的解題成績，對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的態度，更是顯露出輕蔑的態度：

予嘗論之，《詩》解行世者有《序》，有《傳》，有《箋》，有《疏》，有《集傳》，特為致多。初學茫然，罔知專一。予以為《傳》、《箋》可略，今日折衷是非者，惟在《序》與《集傳》而已。《毛傳》古矣，惟事訓詁，與《爾雅》略同，無關經旨。雖有得失，可備觀而弗論。鄭《箋》鹵莽滅裂，世多不從，又無論已。³⁵

上述這一段話顯示出姚際恆將《毛詩序》與《詩集傳》視為可以代表漢、宋兩朝詮釋三百篇的著作，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則僅從事基本的訓詁工作，並不具備權威的身價。顯然，姚氏對於漢學研究成果的蔑視，恰與後來乾嘉學派的重視古學之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後者對於漢注極盡推尊之能事，³⁶姚氏作《詩經通論》的基本詮釋態度則是，凡是無助於讀者理解經旨、詩義者（當然這是依其個人視域而言），他都採取忽略、跳過的方式，不予採用。因此就算是現存最古的解釋——《毛傳》，他也認為因為其所呈現的內容無關經旨，由此可見姚氏想從事的是詩經詮釋的工夫，而非單純的文字訓解。³⁷《毛傳》僅具可以「備觀」的價值，至

³⁵ 《詩經通論序》，《詩經通論》，卷前，頁5：3a-3b。

³⁶ 如錢大昕（1728-1804）就說：「《六經》者，聖人之言，因其言以求其義，則必自詁訓始；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，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為最上乘者，非吾儒之學也。詁訓必依漢儒，以其去古未遠，家法相承，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，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。三代以前，文字、聲音與詁訓相通，漢儒猶能識之。」「漢儒說經，遵守家法，詁訓傳箋，不失先民之旨。」若僅以《詩經》之解釋而論，則戴震（1724-1777）云：「先儒為《詩》者，莫明於漢毛、鄭，宋之朱子。」以上分見錢大昕：〈臧玉林經義雜識序〉、〈經籍纂詁序〉，《潛研堂文集》，錢大昕著，陳文和主編：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第9冊，卷24，頁375、377；戴震：〈毛詩補傳序〉，《毛詩補傳》，戴震著，張岱年主編：《戴震全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年），第1冊，卷前，頁125。

³⁷ 一般而言，「詁訓」是使用今人易於瞭解的語言文字，針對古今異語、各地方言來進行解釋，「詮釋」的目的則不在追求字面意義，而是要進入作品的內在精神世界。詮釋學當然也重視文字解釋，但是，依據阿斯特（G. A. Ast, 1776-1841）的見解，文字解釋旨在揭示古代的精神，由於古代的精神是通過文字展現在我們面前的，因此，語言乃是理解精神的原始媒介，自然也是解釋者接觸作品精神並繼承這種精神的主要途徑，只有在這個時候，語言學才能成為詮釋學的組成部分。在阿斯特看來，理解的三種形式是歷史的理解、語法的理解與精神的理解，後者才是理解的最高層次，此一精

於鄭《箋》既然已被他用「鹵莽滅裂」一詞概括論定，則《詩經通論》對於康成之說割棄不用自可想見。細部來看，雖然姚氏反駁毛、鄭的程度沒有像《詩序》那樣激烈，但基本上反對的態度仍然一致，而反對的理由不外乎附會、拘泥、固陋等。³⁸或許是因毛公之年代較早，《毛傳》又是今存最早為三百篇作注的文字，加上其行文以簡要為一大特色，且多不牽涉到詩旨，³⁹因此姚際恆對《毛傳》的態度顯得較為緩和。相反的，對於鄭玄的箋釋，姚氏多處顯得不耐，加上鄭玄喜歡以《禮》解《詩》，正好犯了姚氏的大忌，所以在《詩經通論》中，姚氏用不少情緒性的字眼批評鄭《箋》。除了常見的附會、迂折、固執等評語外，他甚至說出「笨伯」、「癡叔」、「稚子塗鴉」、「欺世」、「發嘔」等今人所謂人身攻擊之言，⁴⁰可見比起《毛傳》，鄭《箋》更是不得姚氏之緣。在此，姚際恆與前輩學人最顯不同的地方是他對毛、鄭的態度不再是一味的信從，亦即他拋棄了清儒信古、崇古的基本信條，不因爲毛、鄭時代接近三百篇而相信《傳》、《箋》

神理解意味著解釋者必須重視過去歷史或文化中的精神，也要開始關心如何從心理上把握作品、作者的精神世界。不過，毛公之作以「詁訓傳」為名，其釋詩有時也針對詩中所蘊含的義理給予闡釋，此即馬瑞辰所說的「並經文之所未言者而引申之」，再者，《毛傳》（鄭《箋》亦然）解《詩》有善於以史說詩、以禮說詩的特質，換言之，《毛傳》也未嘗不為詩篇進行詮釋的工作，這就不是姚際恆「《毛傳》古矣，惟事訓詁，與《爾雅》略同，無關經旨」之語所能否認的。以上分詳林尹：《訓詁學概要》（臺北：中正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1-2；殷鼎：《理解的命運：解釋學初論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年），頁224-225；王懷宣：《〈詩毛傳〉訓詁隱形理念初探》，《揚州教育學院學報》25卷1期（2007年3月），頁13；陳錦春：《毛傳鄭箋比較研究》（濟南：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，2006年4月），頁24-34。

³⁸ 姚際恆對於《毛傳》的指責以「附會」較多，如批評毛公的解說〈周南·關雎〉之「雎鳩」、「麟之趾」的「麟之趾」、〈召南·鵲巢〉之前兩句。分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，頁19：6a；頁30：28a；卷2，頁31：2a-2b。至於評其「拘泥」者，如〈邶風·燕燕〉的「頡之頡之」；卷3，頁45：7b-8a。謂其「固陋」者，如論《毛傳》之解〈大雅·韓奕〉首二句；卷15，頁209：18b。

³⁹ [宋]魏了翁：「《毛傳》簡要平實，無臆說，無改字。於《序》文無所與。」〈錢氏詩集傳序〉，《鶴山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年），第1172冊，卷54，頁613：20b。

⁴⁰ 姚氏批評鄭玄的解釋「附會」者，可在其解〈周南·關雎〉、〈召南·鵲巢〉、〈采芣〉中得見。分詳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，頁19：7b；卷2，頁31：2a；頁32：4b。「迂折」之評，可在其解〈周南·漢廣〉、〈邶風·柏舟〉中得見。分詳卷1，頁28：24a；卷3，頁43：3b。說其「固執」的，可在其解〈小雅·天保〉、〈小雅·采芣〉中得見，分詳卷8，頁125：11a；卷12，頁168：14b-169：15a。批評鄭玄為「笨伯」、「癡叔」的則見於其解〈豳風·七月〉，卷8，頁113：6a。「稚子塗鴉」之說見於其解〈周頌·噫嘻〉，卷16，頁224：21a。謂鄭玄「欺世」之說見於其解〈周頌·噫嘻〉，卷16，頁223：20b。「發嘔」之說則見於其解〈豳風·東山〉，卷8，頁117：14b。

的說法，反而公開表示：「解經以後出為勝。」⁴¹不崇信古學，不追隨權威，以為後出轉精，晚出之解勝於前人之說。本著此一信念，姚氏自然對於毛、鄭之說採取批判的態度，不會一味地相信，更加不會有為之作疏的想法。

前文言及姚際恆反駁毛、鄭的程度未若批判《毛詩序》般地激烈，對此，筆者的解釋是，姚氏將其《詩經通論》定位為詮解三百篇之作，重心在詩篇的主題研判，訓詁僅其餘事，《毛詩序》的解題長期以來深入人心，不大費力氣予以推倒，難以樹立己說的權威性，至於《毛傳》與鄭《箋》就僅是漢代經生的訓釋詩篇的成果，與《詩》教的關涉相對上顯得較小，不值得耗費過多的精力在這一部分。不過，依照姚氏面對漢學傳統的解詩態度，吾人難免會有此質疑：如果連接近作品時代的先儒舊說、注釋都不可信，那麼對於詩文中出現生難、費解的字詞，又該透過什麼樣的方法才能得知其意？

綜觀《詩經通論》對三百篇的解說，可以看出姚際恆對字詞訓詁的習慣，即簡單明白的詞句都略過不釋，而具有關鍵性的、爭議性的字詞才會作訓解。訓解的依據則是詩文本意，或者從上下文意的發展脈絡而解釋，或者根據詩旨的可能走向而落實。因此，對於字詞的解釋，從毛、鄭、孔之說到宋元明以及當代諸家之解釋，對於姚氏而言，其參考性都不高，甚至不必參考，因為詮釋字意詞義的依據不是漢代的毛、鄭諸人，而是詩文本身。乃至，在面對生僻晦澀之字詞時，如果姚際恆斷定這些文字的理解與詩旨大意無關，他便避重就輕地使用「未詳」或「不必詳求」等語交代過去，且強調面對三百篇只取其大意便可，無須確知詩文中所有字詞之意。筆者這樣說，並不表示姚際恆徹底否認訓詁的基本功能，而是他主張解詩要以掌握詩旨大意為先，至於名物制度以及那些詩人用來表情達意的各種生難字詞均屬次要，無須過於泥求。⁴²姚氏這樣的解《詩》態度，與清代常見的孜孜力求文本中每一字詞之意，連史地、曆算、典章制度的考證都視為必要手段的樸學家相比，可謂大異其趣。這種獨自成家的學風和姚氏的文人

⁴¹ 《詩經通論》，卷5，頁75：11b。

⁴² 姚氏對於詩文中一些無法明確得知其意義的字詞，當他不相信毛、鄭之說，自己又無法詮釋其真正意涵時，他使用「未詳」、「不必詳求」等詞語帶過，如論〈召南·采芣〉之「儻儻」、〈邶風·柏舟〉之「不可選」之「選」、〈鄭風·清人〉「清人在彭」、「清人在消」之「消」、「彭」、〈大雅·大明〉「倪天之妹」之「倪」字等。分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2，頁33：5a；卷3，頁43：3a；卷5，頁77：15b-78：16a；卷13，頁178：5a。至於說只取大意，不必細論字詞之意的，如在解釋〈豳風·九罭〉之「九罭」、「袞衣繡裳」、「遵渚」、「遵陸」；〈狼跋〉之「狼跋其胡」時，姚氏云前詩只如朱子，取其大意便可，後詩則不能詳求，亦不必詳求。分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8，頁119：18a-18b；119：18b-120：19a。

氣質有某種程度的關係，他一方面讀「經」，一方面也讀「詩」。解《詩》之餘，姚氏也關注三百篇的文學性，注意詩文技巧的運用，以為詩人用字遣詞極妙，讀者不必過於深求每一字意，如過於落實，則犯了固執拘泥之病，不僅無法欣賞詩文之美，也破壞了後人對詩意的領悟。姚氏有許多駁斥毛、鄭的言論都是屬於此類，其中最常見者，如謂毛、鄭誤將興說成比、賦，或者誤以比為賦，又如批評毛、鄭不懂得詩文中的比喻作用，因而誤解了詩人的用心，又或者以為毛、鄭不明詩文中換韻、趁韻、協韻的技巧，而將韻腳作出了不當的解釋。⁴³這些賦比興、換韻、趁韻、協韻之法，雖然屬於技巧形式方面的運用，但顯然會牽涉到讀者對詩意的瞭解，所以姚氏才要求讀者要能先知詩文之妙，然後才能進而領悟詩意，理解詩旨。所謂「知其辭之妙，而其義可知；知其義之妙，而其旨亦可知」即是此意。⁴⁴

姚際恆的解《詩》之道突顯出《詩經通論》的一大特色，既要將三百篇與倫理、政治結合來說教，又要重視詩歌創作的藝術性，此一特質確非漢儒著作所有，不過，《毛傳》與鄭《箋》的解《詩》成績有其定評，揚棄前人解《詩》成果，而用「不必詳求」之類的用語來面對諸多經文，如此是否真能對於經典文本之確切內涵「心知其意」，難免會令讀者起疑。平心而論，假若當初姚際恆在訂定詩篇主旨時，放棄以《詩》說教的努力，那麼，這樣的質疑幾乎就不會存在，當然，若真如此，《詩經通論》就不成其為《詩經通論》了。

五、結 語

姚際恆斥《詩序》作者為「瞽者」，僅此一詞，即可知《詩序》在姚氏心目中毫無地位。江瀚（1857-1935）〈詩經通論十八卷提要〉謂姚際恆兼斥《毛詩序》與《詩集傳》，詆鄭玄不長於《詩》、《禮》二書，「而於《毛傳》顧猶取之」，文末則恭維姚書「徇無媿通論之名焉」。⁴⁵不過，透過本文所引姚氏「《毛傳》無關

⁴³ 指出毛、鄭誤解比興之說的，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6，頁93：17b；卷11，頁150：6a-6b；論說毛、鄭誤解詩文比喻的，見卷1，頁26：10a；頁28：24a-24b；批評毛、鄭不解詩文用韻技巧的，見卷5，頁74：9a；頁75：10b-11a；卷6，頁87：4b；頁91：13b-92：14a；卷7，頁104：11a；卷11，頁157：21b；頁158：23b；卷13，頁184：18b-185：19a。

⁴⁴ 引文見〈詩經論旨〉，《詩經通論》，卷前，頁14：13a-13b。

⁴⁵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：《〈詩〉類·《毛詩》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〔經部·上冊〕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頁332。

經旨，其書可略」這樣的總評，就可知道《詩經通論》對於《毛傳》亦不存有美好之印象。此外，鄭玄專於禮學，故多以禮說《詩》，此乃經學史上的共識，其以禮解詩，內容當然未必皆精審，⁴⁶但必謂鄭氏不通《詩》、《禮》，此則流於意氣，難成定論。

整體而言，所有漢儒系統的解《詩》成果都無法得到姚氏的認同，而在清代獨立治《詩》三大家中，也以姚際恆批判傳統的力道最為強勁。不過，誠如西方哲學詮釋學所強調的，沒有人可以做出「不帶偏見和預設」的解釋，人們總是活在歷史之中，總是隸屬於歷史。⁴⁷姚際恆雖然痛批漢儒的解《詩》成果，但是傳統與歷史性也成了姚氏理解三百篇的起點，成為其無法拋棄的前理解（pre-understanding）。前理解決定了姚際恆的《詩》教觀，姚際恆的《詩》教觀又必然使《詩經通論》的解經內涵呈現明顯可見的漢學風味，⁴⁸也就因為如此，其書的經學色彩特濃，以之與重在史學論證的崔述《讀風偶識》，致力文學賞析的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相比，可謂各具特色。當然，這裏所指出的三書特色，是針對其各自的側重面而言，若論整體表現，則姚際恆解《詩》是經學、史學、文學三層面都照顧到的。只是，姚際恆既然對於漢儒的說《詩》成績展開猛烈的攻擊，則其治經取向自然也不會走漢儒擅長的章解句釋方式。為了糾正漢儒說《詩》習慣導致的缺陷，他推出《詩經通論》一書，以掌握詩旨大意為主要的撰寫目標，輔以詩文技巧的說明，藉以讓三百篇所蘊含的聖人深意可以一一浮現，雖然這樣的解經目標能夠達成多少，仍有待後世研究者的細心檢驗，但由姚氏成為方玉潤心目中的權威，⁴⁹又廣受今人討論，⁵⁰可知姚際恆的說《詩》成果確實擁有極大的

⁴⁶ 詳陳澧：《東塾讀書記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年），頁109-110。

⁴⁷ 加達默爾（Hans-Georg Gadamer, 1900-2002）著，洪漢鼎譯：《真理與方法》（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上卷，頁357。

⁴⁸ 僅以首篇〈周南·關雎〉、〈秦風·蒹葭〉為例，姚際恆釋〈關雎〉篇旨云：「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，以見嘉耦之合初非偶然，為周家發祥之兆，自此可以正邦國，風天下，不必實指出太姒、文王，非若〈大明〉、〈思齊〉等篇實有文王、太姒名也。」雖其不願接受《詩序》「后妃之德也」與朱《傳》「后妃，文王之妃，大姒也」之論，但所謂「周家發祥之兆」、「正邦國，風天下」云云，正是漢學風味。又如其解〈蒹葭〉云：「此自是賢人隱居水濱，而人慕而思見之詩。」雖不採《詩序》「〈蒹葭〉，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禮，將無以固其國焉」之說，但其解釋格調仍可歸屬於漢學系統。以上分見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，頁5-18a；卷7，頁100：4b。

⁴⁹ 方玉潤自謂解《詩》「不顧《序》，不顧《傳》，亦不顧《論》，惟其是者從而非者正」，〈自序〉，《詩經原始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1年），頁6。足見在方氏心目中，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《詩經通論》屬於可以平起平坐的權威之作。

⁵⁰ 近二、三十年來，姚際恆的學術相當受到學者的關注，僅以《詩經通論》而言，就不虞數十篇之多，其中專書及學位論文包括詹尊權：《姚際恆的詩經學》（新加坡：南安會館，1987年）、簡啟楨：《姚際恆及其詩經通論研究》（臺北：全賢圖書公司，1992

影響力，在清代《詩經》學史中，《詩經通論》可以確定已經佔據了一個重要位置。

徵引文獻

(一)古籍

- 〔漢〕毛亨傳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。
-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。
- 〔三國·吳〕陸璣著，〔清〕丁晏校正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。
- * 〔宋〕王質：《詩總聞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4。
- * 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71。
- 〔宋〕魏了翁：《鶴山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。
- * 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1。
- 〔清〕朱彝尊著，馮曉庭等點校：《經義考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第三冊，2004年。
- * 〔清〕江藩著，鍾哲整理：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。
- 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62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- 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林慶彰主編：《姚際恆著作集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第一冊，1994。
- 〔清〕姚際恆著，簡啓楨輯點：《禮記通論輯本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4。
- 〔清〕姚際恆著，張曉生點校：《春秋通論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，1994。

年3月)、文鈴蘭：《姚際恆詩經通論之研究》(臺北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4年6月)、趙明媛：《姚際恆詩經通論研究》(桃園：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0年12月)、左川鳳：《姚際恆與戴震詩經研究之比較》(蕪湖：安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03年9月)、孟麗娟：《姚際恆詩經辨偽及其治經方法》(台中：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4年6月)、陳景聚：《姚際恆、崔述與方玉潤的詩經學簡論》(西安：西北大學碩士論文，2004年9月)、吳超華：《姚際恆的詩經通論研究》(福州：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07年11月)、樊萬龍：《姚際恆詩經通論研究》(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，2009年6月)，研究狀況可謂漪歎盛矣。

- *〔清〕紀昀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。
〔清〕徐世昌纂，周駿富編：《清儒學案小傳（一）》，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。
〔清〕陳澧：《東塾讀書記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。
〔清〕錢大昕著，陳文和主編：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7。
〔清〕戴震著，張岱主編：《戴震全集》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。

(二) 近人論著

- 王禮卿：《四家詩旨會歸》，臺中：青蓮出版社，1995。
王懷宜：〈《詩毛傳》訓詁隱形理念初探〉，《揚州教育學院學報》25.1，2007：12-16。
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：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。
村山吉廣〔日〕撰，林慶彰譯：〈姚際恆論〉，收錄於林慶彰、蔣秋華編：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上冊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6：65-87。
村山吉廣〔日〕撰，林慶彰譯：〈姚際恆的學問（下）——關於詩經通論〉，收錄於林慶彰、蔣秋華編：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中冊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6：385-415。
何定生：〈關於詩經通論〉，收錄於林慶彰、蔣秋華編：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中冊，頁363-370。
*李家樹：《詩經的歷史公案》，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。
*加達默爾〔德〕（Hans-Georg Gadamer）著，洪漢鼎譯：《真理與方法》，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1999。
林 尹：《訓詁學概要》，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74。
林慶彰：《清初的群經辨偽學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0。
*林慶彰：〈姚際恆對朱子詩集傳的批評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8，1996：1-24。
林慶彰：〈本冊校印說明〉，收錄於《姚際恆著作集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卷前，第一冊，1994：1-4。
徐復觀：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2。
夏傅才：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3。
殷 鼎：《理解的命運：解釋學初論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。
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學術史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5。
*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。
陳 柱：〈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〉，收錄於林慶彰、蔣秋華編：《姚際恆研究

- 論集》中冊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1996：341-362。
- 陳錦春：《毛傳鄭箋比較研究》，濟南：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，2006。
- 張秀英：〈詩序作者與時代研究綜述〉，《重慶郵電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9.5，2007：121-127。
- 梅顯懋：〈詩序編撰時代考論〉，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29.1，2006：90-93。
- *黃忠慎：〈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——從朱子到姚際恆、崔述、方玉潤〉，《興大中文學報》22，2007：125-158。
- 趙明媛：《姚際恆詩經通論研究》，桃園：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0。
- 鄭良樹：《古籍辨偽學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6。
- 顧頡剛：〈古今偽書考·序〉，收錄於姚際恆：《古今偽書考》，北京：樸社，1933，卷前，頁1-19。
- （說明：徵引文獻前標示 * 號者，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）

Selected Bibliography

- Fang, Yu-run. *Shi Jing Yuan Shi*. Taipei: Yi-wen Press, 1981.
- Huang, Zhong-shen. "On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Classical Meaning of Shijing by Song and Qing Confucian Scholars-From Zhuzi to Yuan Jiheng, Chui Shu and Fang Yurun", *Jornal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,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*, 22,2007, pp.125-158
- Hans-Georg Gadamer, Hong, Han-ding trans. *Truth and Method*. Shanghai: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, 1999.
- Jiang-Fan. Zhong-Zhe (arrange). *Guo Chao Han Xue Shi Cheng Ji*. Beijing: Zhonghua Books, 1983.
- Ji-yun. *Si Ku Quan Shu Zong Mu*. Taipei: Yi-wen Press, 1974.
- Li, Jia-shu. *Shi Jing De Li Shi Gong An*. Taipei: Da-an Press, 1990.
- Lin, Ching-chang. "Yao Chi-heng's Criticisms of Chu His's *Shih Chi-chuan*", *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*, 8, 1996.5, pp.1-24.
- Liang, Qi-chao. *Qing Dai Xue Shu Gai Lun*. Shanghai: Shang-hai Gu-ji Press, 2000.
- Wang-zhi. *Shi Zong Wen*. Taipei: Xin-wen-feng Press, 1984.
- Zhu-xi. *Shi Ji Chuan*. Taipei: Zhong-hua Books, 1971.

The view of moral education of *Shi Jing*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ti-Han school of Yao *Ji-Heng Shi Jing Tong Lun*

Huang, Chung-shen

(Received November 25, 2010 ; Accepted April 13, 2011)

Abstract

Yao Ji-Heng and Cui-Su, Fang Yu-run were called the three masters of *Shijing* in Qing Dynasty .They had the most independent spirit in their research .They had a strong critical character in their books, Yao Ji-Heng *Shi Jing Tong Lun* especially. The more authoritative and paradigmatic those works are, the more easily they tend to be the object of Yao Ji-Heng's criticism.In this particular interpretation of the viewpoint, the Han Dynasty, Mao School representatives——*Shi Xu,Mao Chuan,Zheng Jian*, as the target that Yao Ji-Heng wanted to overthrow. In this thesis, we analyzed the view of moral education of *Shi Jing* and the anti-Han school feature of Yao Ji-Heng, generalized and remarked the work of Yao's criticizing *Shi-Xu,Mao-Chuan,Zheng-Jian*. In the end we pointed out the Han school savor of the intention in Yao's explanation,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clearest character of Yao's book.

Keywords: Yao Ji-Heng, *Shi Jing Tong Lun*, *Shi Xu*, *Mao Chuan*, *Zheng Jian*